

●纪念欧文·白璧德逝世 70 周年

编者按

欧文·白璧德(1865—1933),美国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人物。1894年起,欧文·白璧德即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系。他特别提倡人类的负责精神,认为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故而在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这些看法与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冲突,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欧文·白璧德的学说与中国儒家有多方面的认同,20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一代中国学人,开启了新人文主义与儒学沟通的新阶段。我们期待:在当前,以欲望和消费主导一切的、支离破碎的现代社会,新人文主义将会为促使社会进步,复归被异化的人性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人之师表：欧文·白璧德^①

梅光迪 文 段怀清 译

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文·白璧德,是在1914年或者是1915年,还

① 此文原收于由 Frederick Manchester 和 Odell Shepard 共同编辑的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 一书,美国 Greenwood Press(纽约)1941年初版,现根据1969年再版本翻译。

是在与 R·S·克莱恩(Crane)交谈中偶然谈到的,后来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时候,克莱恩指着《现代法国批评大师》这本书对我说:“这本书会让你思考。”于是,就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这些书给我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语汇。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上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或许我1915年的秋天来到剑桥,拜师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圣人的目的就在于此。

我想,那时的白璧德刚过五十,已经是完全成熟而且他的风格已趋定型的时期。尽管精力不是非常旺盛,但他看起来身体很好,他的头发稀薄,肤色白皙。晚年明显佝偻的身躯那时还几乎不太引人注目,每次去教室上课和从教室回来,他都是步伐快捷,似乎是一溜小跑。他那极度文雅和沉静的特点,只出自哲学家兼学者之人,而非世间凡人所能有。即便是第一次与他交往,你也会发现他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人:他让你想起那些古代掌管人的整个命运的哲学家,而不是现代学术圈中只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众所周知,白璧德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普通意义上的学问,即便在学识上,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与他们一样学识广博,但是他的灵活性却没有几人能够企及。白璧德的重要性在于他能够清理疏通和阐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线索的基本观点。在日常为师,或作为有着繁重编辑工作的编辑,他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于普通观点的分析之上,跳过了纯粹的美学特性以及文学中历史的和文本的问题。尽管白璧德对风格有着很强的感悟力,实际上他也很关注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还是把纯粹的美学特性以及文学中历史的和文本的问题,看作相对来说与批评家生活不大相关的东西。因此,自从他大力呼吁宣扬命运解放以来,白璧德

的每次演讲本质上就是观点的对立冲突以及对西方人的命运观的宣战。他的演讲结构松散,但倘若整理一下结构,从世界文学中引用一些中肯的引语——用明智的评论来做引语,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些讲演就会构筑出一个中心的主题。分辨出白璧德所担任的课程中的某个内容与其他内容的不同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所有的课程都是相互关联并服务于一个目的的,并提出相同的基本原理,不同点只是它们在重点和细节之处上存在着差异。你可以去选修他的任何一门主要课程,去领会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并且以此来获知他在其他课程中所揭示出来的思想。对他思想的掌握,也可以受到他在课程讲解过程中经常重复的某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引语的启发。这些借引的阐述有助于你,就像那些路标,与他一起进行知识朝圣之旅。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阐释当中缺乏新鲜的材料,并使得他的阐释总是充满令人乏味的重复。相反,他的同时代的学术巨人中,几乎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在材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与他相媲美。但是,他明白,他对那些警句式的、合适的阐述的一定频率的重复,有助于加强一般大众那健忘的记忆中对他所传递的信息的记忆——这是他颇为欣赏的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高明的广告宣传者有着共同之处。他坚持有技巧地重复同一事实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它有助于那些听众们明晰他的思想的要旨,其作为一个统一体和核心,无论他是在论述任何一个重要话题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整个期间他都是坐在桌边,他的讲课方式就此而言非常单调。他的声音清晰而且控制得当,但很少作出强调。如果需要强调,他会伸出右臂,作出一种半圆环形,就像是想把他自己的观点推得离他的听众更近一点一样。他会不时地瞥你一眼,眼神是善意而坦直的,甚至看上去还有点不好意思;给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头会略微朝左倾斜一点,他的右臂在空中伸出去,似乎在那里等待着并试图抓住一个答案。一个大胆的学生,通常是坐在教室前排的,会不揣冒昧地给出一个答案,但这很少能够成为一个与之相应的话题。任何刻薄的智慧或者偶尔的引语,

特别是那些破坏性的，总会引来安静的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然而，对于那些赞同他的观点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对他最为接近的那些学生来说，我深信——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成了一次特别的表演。他一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了一个大师的出现。立刻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思想上的活泼与严肃共存的气氛。你清楚，无论他准备就哪个已经给出的话题进行演讲，他所阐述的，都会跟你所熟知所习惯的一切不一样，而且，他会用一种积极的、决绝的态度来阐述他的这些思想，他会把自己真实的思想呈现给他的信仰者，并对那些怀疑论者提出论战，直至问题终结。在引用了某些公认的思想权威的观点之后，他会直言不讳地说：“我完全不能够同意他的观点。”尽管他的性情得到了极好的训练控制，并有一种冷静的威严，但他自己可能会因为否决了那些绝大部分现代思想的最高统治者们的观点而很少能够使得他的听众产生真心实意的满意。当然，卢梭是他的特殊靶子，而且他也很少会对卢梭所钟爱的幻想弃置不顾。那些在对现代西方受到推崇敬畏的传统的滋养之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毫无疑问会被白璧德毫不留情的破除偶像的行为弄得痛苦不堪。但是，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这却是一种快乐的经历，因为他对几十年来西方人精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对他来说自然也就是中性的、开放的和自由的，不需要服从任何个人的或者承继下来的服服帖帖。推测起来，对于白璧德早期的一些学生来说，是个人反抗或者孝顺的衷心，使得他们成为了对他怀恨在心的对手，这通常发生在一旦他们离开了他的“手心”，并获得了攻击白璧德这个批评家最犀利的机会的时候。至少是最近几年，白璧德在他的教室里建立起了毋庸置疑的权威：再也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激烈的论战也几乎不再有。尽管还不清楚那些默许的学生究竟是被他的学识和个性所折服，还是已经完全真正被转化，但有不少显然是属于后面一种类型。但是，来听他的课的学生越来越多，直至后来他的有一门课只好改在第11教学楼里，那里可以容纳三四百学生，通常是留给规定的和普通课程的。白璧德经常语气轻松愉快地对我说：

“我的学生已经多得超过了我的能力了。”

白璧德决不是他的那些对手们所讥讽的那样一个被奉为教主一般的教师和道德家。敏捷的想像和丰富的幽默意识足以让他与孟子、约翰逊和卡莱尔并肩齐列，这些人远在一般的写作者之上，尽管也有人指控他们过于呼吁人们朝向一种精神汇总累积。如今，尽管想像和幽默在对话中比在正式的讨论中更好地得到了展示，这些伟大的写作者，同样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伟大的善谈者，或许还是作为世界上最为善谈的人存在着。出于同样原因，作为一个谈话者，在教室正式的氛围之外，白璧德也是可以被列入前茅的。

毫无疑问，他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遇到了他的知音。但是，我却怀疑那些走近他身边并公开声称为其信徒的人，是否敢于抵制他的那些最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在他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他倾注了巨大的活力和智慧的结果。至少，一个心甘情愿的倾听者的谦逊态度，会更为令人产生好感，也更有利于他在查尔斯大街上的傍晚散步时心绪的安宁和休息。而且，在他身边，谈话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轻盈，以及一种自觉，或许这也反映出了他的思想力量，这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更为令人生畏的好斗。

在我心目中，白璧德的谈话，充满了意想不到和令人极为愉悦的智慧和洞察力，而且具有相互对立矛盾以及极为宽泛的自由的所有魅力，但是从来不曾过远地偏离人文主义者信守的原理。白璧德似乎对所有适宜于人的活动都有兴趣，作为一个具有自己个人性情的人文主义者，他应该而且也急于呈现出来对于大多数话题都感兴趣，从内在生活一直到印度、中国和日本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他的那些话语，平稳而大量地流动着，就像是一条平缓地流动着的河流。而你的唯一贡献，就像是一块中流巨石，或者就像是它的边沿的一道曲线或一个缺口，均匀地在这里、那里滋扰着流动着的河水。在一阵轻微的滋扰或者不适当地长久沉默之后，他会突然将他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投向你，半是严肃，半是好玩，探询你是否已经明白了他的观点。而他的反驳，如果需要的话，总是转

瞬即逝的,决定性的,同时也是刺激着你的思维,让你有时候忍俊不禁的。

“对于那些思想者来说,生活是一个喜剧,而对于那些感受者来说,生活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句他喜欢引用的警句。人们可以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所有著作和谈话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刻的真挚,人们或许也会猜测,在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是否有过瞬间的绝望,或者对于人的存在的最本质的悲剧的一种可怕意识。但是,总体而言,他极其富于一种自我愉悦的能力,而这又被一种综合的、被抬升到很高的生活观所加强,以至于能够均一地获得一种庄严的安宁和超然的高度。作为那些靠着对他们的民众溜须拍马而获得声名的现代预言家的反对者,白璧德从来不曾是一个与之仿效的人,特别是当他有机会纵容自己在想像和轻松的逗笑的时候。他显示出自己对于将人的内在揭示出来的巨大兴趣,并暴露出那些在华而不实的托词背后的真实的一切。他把自己称之为一个道德现实主义者。他说,一个道德现实主义者的首要标志,就是“拒绝上当受骗”。

在他看来,自我兴趣是指导人的行为的动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譬如,诚实就是它的拥护者能够提供某种直接的个人利益、物质或者其他东西的东西,而它的实践很少被抬升到漠不关心的地位。他对国际间的协定,或者一本正经地表示出来的利他原则殊少信任。不过,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英国托利党人的外交政策的现实性。而不赞成它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式的对外冒险,他对威尔逊式的国际政客间的关系持绝对怀疑的态度。他宁愿各个国家适当自卫,而后顾及好自己的事情。

很自然地,我和白璧德的谈话的相当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我不知道白璧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的祖国产生严肃的兴趣的。当我们初次相见的时候,他已经对孔子和早期道家思想有了足够的了解,尽管他还没有对此写过一个字。无论如何,他是西方作家中第一个对儒家学说的人文精华作出评价,并发现早期道家与那些现代西方的自然主

义信徒之间的契合,并因此而确立起了两种对立的、普遍的思想秩序分开来的生活观。在佛陀之后,孔子或许是性情上最为令他亲近的一个精神导师。带着一种深深的宗教意识,白璧德坚信,人身上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喜欢将自己的宗教称之为“伟人的宗教”,没有恩典的利益回报,或者仲裁者的慈善义务。从儒家学说角度来看,这种宗教是由各个时代那些圣人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机械地表现出来的很高的伦理原则积累起来的一个整体,而且还经过了直接的个人经验的检验。白璧德和真正的儒家认为,那些通过个人主观努力而宣称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思想帝国的个人都是绝对重要的。在他所谓的“道家明智的消极保守”中,他看到了精神上的一种滑稽化和精神自杀,尽管他并不否定道家学说在美学上的创造性价值,特别是在中国山水画中所超凡地包含着的美学上的价值。他习惯将他讲座中有关罗马人对于好逸恶劳的崇拜与一幅宋代的绘画中所描画的一个道家哲学家醉酒湖上、泛舟中流、远山如黛的画面所吸引相提并论。就在他去世前一两年,我曾经对他说最遗憾的是他不懂汉语,否则他就会充分利用那些思想资源,并来解救那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诠释;在他们那里,中国文化要么被他们装饰成为安置在博物馆中的埃及木乃伊,要么就是从他们自己的想像出发来对中国文化作出错误的诠释,——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是“科学的”,要么是“印象式的”,缺乏必不可少的哲学洞察力、文学才能和扎实的学识三者之间的结合(义理、考据和辞章)。至于我向他所提出的那个假如他年轻二十岁,他是否会学习中文的问题,他曾经一脸严肃地回答道:“我会的,如果能年轻三十岁的话。”

当然,对于那些浅薄无知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所宣称的所谓现代中国的东西,白璧德不抱任何幻想。事实上,在考察众所周知的这个孔夫子的一向保守的国家所正在发生着的种种方向错误的转型的时候,白璧德毫不隐瞒自己的惊诧,尽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固有的缺陷并不清楚。他甚至对一种真正的儒家的复兴也保持着警惕,这种复兴只是试图延续中国民族生活的历史连续性,为

此有必要向其中灌输一些现代西方因素,以达到明智调整的目的。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他从1911年之后的中国的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中已经预见到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强人”出现的征兆。而且他也经常反复警告日本扩张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这也是日本国内同样混乱的结果。他情愿看到中国发展潜艇力量以有效地保卫海防,而不是去发展一个完整的海军体系,因为在当时中国政府是根本没有时间等待的。他认为,过去中国可以自由地陷入到“内战频仍”当中,其时衰微的皇朝根本不需要匆匆忙忙地选择一个继任者,并将皇权传递给他。但是如今面临外族列强的压力,特别是日本的压力,却不允许中国依然按部就班地享受他们拖延已久的政治假期。他会不时地提醒你目前政治形势的极度糟糕愚蠢,就好像你是应该对此负责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对我来说,并不必要去说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恰恰显示出了白璧德当初的预见有多么的精确。

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多少有些拘于礼节,认为或许这是一个东方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所需要的。譬如,出门时他总是坚持让我这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学生先行,只是偶尔地他才会在此方面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如果我的观察正确的话,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学生或者来访者的彬彬有礼,甚至不惜拘于礼节。总体来说,他对社交生活当中的虚伪礼节没有任何兴趣。偶尔有一次,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因为保卫了自己弱小国家免遭涂炭而成为了举世皆知的英雄的欧洲国家的君主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白璧德对学校当局要求正式着装出席接待这个尊贵的来访者的邀请却不屑一顾,而是若无其事地信步走进了校园。他经常躲避掉学校的毕业典礼,当他作为一个父亲而必须出现在自己儿子的毕业典礼上的时候,他只能大笑着宣布,“这是我多年来首次参加的毕业典礼”。

一切有形的证据都表明,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学术世界中,白璧德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他就像是天上的一颗独行的星星,不属于任何一个星系。他注定要在一种阻碍他的个性才能开花结果的环

境中度过他的一生。这也似乎是应当如此。人类的历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总是充满了那些殉道者的头颅和烧焦了的身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成为了人类的爱人和恩人。剑与桩都已经过时了,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是如此,但对那些胆敢挑战权威的人的诅咒和惩罚却依然有效,而且也并没有过时。白璧德的思想上的盟友P·E·摩尔写道,“那些逆世界信仰而行的人,无疑需要所有人的忍耐力和所有人的力量”。他还进一步说到了“知识思想上的孤独”。这些话具有一针见血的真理性,完全适合于白璧德,也同样适合于摩尔自己的经历,尽管两个人本质上都是一个写作者,与当下那些浪漫症患者的写作迥然不同——然而,我坚信这是所有文学都追求的爱好的——对于个人不幸的浪漫宣传。白璧德是这个无英雄时代的最后一个烈士。他总是保持着自己早年的努力,与自己青年时代所保持的一些痼习相一致,最近他在自己的一本新著中将其称之为“列阵而行的幼狮”。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当那些激进的作者们欢欣鼓舞地预言各个国家将发生政治和社会上的巨变的时候,白璧德依然用他那惯常的幽默说,这些年轻的改革者指望用“人的善良的牛奶”冲刷整个世界,“他们会首先把我烧死在树桩上,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势”。

真理是,一个得到保佑的人,或者受到诅咒的人,其意识不同,也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但相反,他们也是与日常审慎相反。大多数原创性的头脑在这些诸如社交和手段方面的社会德性方面都显得声名狼藉。他们的恶意批评者将他们身上的这种短处归咎于自我中心主义或者偏见。但在现实中,他们看上去相互排斥的自我吸收和自豪就其起源来说并不是个人性的。他们碰巧比那些普通之人对于精神自我保护和价值拥有一双更和善的眼睛和更加深邃的洞察力,而这只有用一种对他们适宜的方式才可行。对于孔子和孟子来说,他们当时也只是一般的普通之人,给那些王公贵族的肠肥脑满以一种思想上的刺激,并使得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服服帖帖,这也同样是非个人的。据说韩愈(768—824),这个中国文学中的

约翰逊，他在应对他的那些同时代人时，就像是一个正在对犯人进行宣判的严厉的法官。白璧德确实指出了约翰逊——这个“孔子之后最睿智的人”对待他的同时代人是多么傲慢，白璧德曾经这样称呼他——这已经是在上帝面前最大的不恭了。白璧德自己保持着一种相当高程度的温和，因为他的理想就是法国的“和悦之士”和儒家的绅士——学者，这是一个“不是俗人的世俗之人”。对于那些他所选择的来取悦的人来说，他的魅力是难以抗拒的。但是，他最终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或者对任何思想交流给予礼貌肯定的人。他从来没有放弃告诫你去追寻那些活着的死去者的“更高的陪伴”，并将你自己从与同时代人的不可救药的阴谋中解脱出来。

在最后的分析中，白璧德是传统类型中的激进者。现如今这种类型的激进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中的精英个人，同时也是知识和性格的贵族的坦诚支持者的特殊地位。他坚信，一般而言，人们都有一种按照世界看上去的样子来接受它的倾向，而不是通过先天的不拘泥于教义主义或者只是为了个人方便而去直言不讳。他认为，他们迅速掌握了事物形式的世间价值，并逐渐将现实丢在一边。无庸讳言，对于现实的毫不妥协的追求，总是带来了个人灾难。孔子就被那些封建领主们视为一个令人厌烦的自大的好事者；他不仅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职位，而且还几次遭遇到现实危险。他的那些后来的追随者们的名字是数不胜数的，他们因为自己的诚实和不妥协而遭遇到了流放、监禁或者砍头的厄运。苏格拉底被毒死，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洞察者洞悉事物真正意义的思想的对于他的同胞来说太耀眼了，他就像各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非常欣赏意志力。在少数与多数之间总是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冲突。对于白璧德来说，很遗憾的是出生在一个“激进”这个术语已经被扭曲成为普通事业而战斗的人的代名词的时代，随着大多数人的结论而作出反应这一种类型的领袖，很难说适宜于任何英雄主义。

就其自身而言，白璧德从来就没准备承认因为不广为人知而

作出的个人牺牲。他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在文明的记录中的命运较量中拼搏着。如今，他已经作古，他的那些文字，却依然将作为一种宣言和宏大的战略计划而服务于一场战争，直至在人的价值领域中的最后一道壕沟也被占领。而且，这也是他的思想的阐释者的职责，即强调他的使命的重大以及他的性格中的最基本的英雄主义。这个人和他的著作都属于那种不止一次地辩护被激发起来的个人的超越的个人勇气，来说出他们发现的他们自己时代的真理的勇气，而且坚信这一真理终将时兴于时。爱默生说，“一个大师的成功，在于二十年后能够把人们聚拢在他的思想周围”。这是一种典型的爱默生式的体面的乐观；然而，一个中国人却可以因为不愿意将美国式的热情传递而得到谅解。要检验我们现代的不耐烦，还是让我们听听一个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如何说的，并来安慰我们精神王国的命运定数的吧。在一个对韩愈文集旧版本所作的注释中，儒家和古典文学的伟大复兴者欧阳修（1007—1072）——他的地位与韩愈并列，并对韩愈思想的发阐抱有使命与责任——曾经热心地并十分肯定地这样写道：

当然远古时代而不是近世存在着一些真理，它们过去被忽略了但其价值现在才又显露出来。这不是因为日常世界的好恶而引发的，而是事物本质上就是如此。因此，孔子和孟子在他们自己时代都是鲜为人知的，但却成为后来者的万世师表。韩愈的著作在式微了两百年之后如今又声誉鹊起。这并不只是一个趣味上的差异而已的问题。因为对真理而言，时间越久，它们也就越是突出，因为它们是不能够被消灭的。它们可能在当时显得怪异，但最终它们将熠熠生辉。（附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中引文原文：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

也——译者)

如今,韩愈与欧阳修都是儒家意义上的文人,他们对于文的诉求与对于道德崇高的诉求是同等的。他们都早已经位列全国性的“机构”——孔庙当中。人们也可以想像白璧德所享有的相同荣誉,另外一个儒家理想的声名显赫的典型,要是他诞生在不晚于十七世纪的中国的话——这也是中央帝国行将落没之时的最后一种可能。“要找到一个古典学教师不难,但要遇上一个人师则不易”,这是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名言。而白璧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之师表。